

生产者、保护者与分利者：贫困村基层组织的多重角色^{*}

程杰 武拉平

摘要：通过采用生产、保护和分利模型，并利用全国范围的行政村数据，对我国贫困村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条件下，贫困村基层组织可能承担着生产者、保护者和分利者的多种角色，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分利技术或寻租动力以及较多的潜在分利者情况下，贫困村的经济资源将以高比例保护、低比例生产的配置方式实现均衡，从而导致寻租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贫困村由此陷入了一个低水平均衡收益的“贫困陷阱”。为走出“贫困陷阱”，政府应当采取加大扶贫力度，完善扶贫监督机制，将扶贫资金、项目和贷款制度化等各项措施。

关键词：生产 保护 分利 贫困村 基层组织

一、引言

贫困村 S 的财务凭证显示：非建设性支出占财务支出总额将近 90%，其中招待费占支出总额的 70.21%，办公经费占支出总额的 15.94%，实际建设费用仅占支出总额的 11.05%。非生产性支出是村级财政资源的主要投向，其中寻租活动成为重要内容，它表现出两种形式：一是以防止本村的经济资源（确定为重点扶贫村能获得的扶贫资金和项目）不被其他村获取而进行的寻租活动，这种活动具有相对的保护性质，体现了村级组织的保护者角色；另一种是以获取其他村经济资源为目的的寻租活动，这种活动具有相对的分利性质，体现了村级组织的分利者角色。寻租活动直接导致了贫困村生产性资源的外流，从而限制了脱贫的步伐（程杰，2007）。

为什么贫困村不能将有限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性建设，而更多地投向寻租活动呢？作为生产者和保护者的贫困村与分利者的贫困村之间的决策行为会如何相互作用呢？这些保护性和分利性寻租活动对贫困村发展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尝试性地利用生产、保护与分利模型来解释这些问题。

二、文献综述

生产、保护与分利的相关模型分析了资源在它

们之间的配置对经济收益和人均收入的重要影响。Hirshleifer(1988,1991)建立了简单的模型，描述了两个竞争者通过生产性和分利性的活动来分配初始资源禀赋，产出由生产性活动创造，而这些产出将由两个竞争者根据他们的分利性努力和斗争技术的高低来共同分割。Skaperdas(1992)扩展了这个模型，将更为一般性的生产和斗争技术融入分析框架中。Murphy(1993)、Acemoglu(1995)以及 Grossman和 Kim(1995,1996)分别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模型。这些模型基本假定个人可能是生产者（保护者）或分利者，分利者试图获取他人的产品，而生产者使用资源来生产产品和保护产品不被分利。资源具有三种用途：生产、保护和分利，经济的理性人将最大化其获得的产品数量。因此，生产者在生产和保护之间进行资源配置以使两种活动的边际收益相等。同样，个人在作为生产者或作为分利者之间进行选择，以使两者的私人边际收益相等。

Acemoglu(1995)分析得出，随着寻租者或组织的数量增加，将有更多的资源被用于利益的保护中，而且寻租存在一个自我增强的乘数效应：当寻租者或组织数量增加时，生产的吸引力将下降，并导致寻租人数的进一步增加。Grossman和 Kim(1996)的掠夺者-被掠夺者模型分析了一个选择生产和分利的潜在分利者与一个选择生产和保护的被分利者之间的

^{*} 本文讨论稿在 2007 年第七届中国经济学会年会（深圳、中国香港，2007.12）上交流，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和建议，并进行了相应修改，在此表示感谢。

相互作用,模型假定分利者和保护者通过一个两阶段连续博弈进行资源分配,并得出结论:随着分利者掠夺能力、动机的增强,分利的均衡比例将从0(不分利)逐渐上升到1(不生产),然后再下降到0与1之间的一个均衡比例(部分分利)。

Durham等(1998)对Hirshleifer模型进行了实验性测试,这一比较静态分析考虑了相对资源禀赋的变化,结果支持了一个纳什均衡预测。Carter和Anderton(2001)对Grossman和Kim的掠夺者-被掠夺者模型进行了实验性测试,这一测试包括了8个连续的决策期,考虑了决策主体的斗争技术的变化,研究结论支持了子博弈完全预测,并得出了一个明显收敛的均衡结果。

Brennan和Hamlin(1995)利用该模型解释了个人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道德选择问题。在社会标准的内部化方面,Lindbeck(1996)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并阐述了经济性激励的作用机制。Grossman和Kim(2000)扩展性地提出了道德腐蚀与道德复苏模型,将经济主体分为道德者和不道德者,前者将所有的资源投入生产中,不会选择分利活动,而后者则既可能选择生产也可能选择分利,这依据生产和分利的诱惑性大小来选择。文中重点关注了不道德者的生产和分利的选择与道德者的保护性资源投入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得出了分利者与生产者的最优比例,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在跨期条件下道德者与不道德者行为决策的动态变化。Guttman(2000)、Brickley(2002)、Grossman和Kim(2002)也进行了相关讨论和延伸。另外,Mauro(1998)和Sarte(2000)等将生产、保护和分利模型与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结合,分析了保护活动和分利活动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均衡和收敛中的作用。国内学者对于该模型的相关研究较少,散见于金融市场投资者竞争策略(仲黎明、刘海龙、吴冲锋,2006)和商业主体间竞争行为(田秀华等,2006)方面。

生产、保护和分利相关模型从寻租的角度分析了经济主体的资源配置行为及其对均衡收益的影响,但多数模型的研究对象为个体,而且基本上假定生产者的生产函数是一对一的,或是简单的线性生产函数,即未考虑生产力因素。本文将生产、保护和分利模型尝试性地应用到贫困村基层组织的行为决策中,并进一步在生产函数方面对模型进行扩展,考虑贫困村生产力或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影响,以分析当前我国贫困村发展存在的核心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利用以行政村为调查对象的农村

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基本研究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模型分析

(一)基本假设

当前贫困村经济发展缓慢,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经济资源渠道有限,财政转移支付直接影响贫困村的经济收益和发展水平。村级基层组织是贫困村作为经济主体的代理者,他们的基本经济活动是获取财政转移的经济资源,决策行为体现出保护性和分利性。我们假定某地区贫困村的贫困程度相当,财政转移支付(扶贫资金、项目、贷款等)水平对各个村是平等的。将贫困村分为道德村和不道德村,道德村将资源投入生产性建设中,而不道德村可以选择生产或分利,分利就是通过寻租行为获取道德村的经济资源,这取决于生产和分利的收益大小。我们用M表示不道德村占道德村的比例,R表示分利村占生产村的比例,由于不道德村可以选择生产或分利,所以 $R \leq M$ 。

假定贫困村有相等的初始资源禀赋F,如果一个村选择做生产者,就必须要将初始资源在生产和保护用途之间进行分配,生产创造价值,而保护仅仅是为了避免或对抗分利行为。现实情况中,贫困村的保护行为可表现为争取扶贫资金和项目而进行的寻租活动,目的在于避免本村的扶贫资金和项目被其他村通过寻租活动获取,而后的寻租活动则是分利行为。用f表示道德村将资源投入到保护的比例,1-f则为投入到生产的比例,如果生产性函数是一对一的,则生产村的总产出为 $F/(1+f)$ 。生产村将能保留一定比例的产出,而另一部分被分利村通过寻租活动获得,保留的产出比例用P表示,被分利的比例则为1-P。分利村占生产村的比例R以及物化的分利技术(反映了分利村的寻租效率和动力)将影响P,我们将影响方式表示为:

$$P = \frac{1}{1 + R/f}, \quad 0 \leq f \leq 1, \quad 0 \leq P \leq 1 \quad \dots\dots (1)$$

随着分利村比例、分利技术的提高,生产村保留的产出比例下降,即将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被分利;随着资源投入保护的增加,生产村保留的产出比例上升,即将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资源被分利。

(二)均衡分析

1. 目标函数

若所有贫困村都选择分利或保护,则没有生产,不道德的收益将趋向于0;若都选择生产,则分利的边际收益很高,将有强烈的不道德激励。因而,贫困村基层组织可选择做道德村或不道德村,且道德村生产和保护的资源配置以及不道德村生产和分利的

决策存在均衡状态,我们通过构建生产村和分利村的经济收益的目标函数来寻求均衡条件。

生产村投入一定资源创造出总体产出,但仅仅能获得其中的一部分,用 A 表示:

$$A = P \cdot \frac{F}{1+f} \dots\dots\dots (2)$$

分利村不投入资源到生产中,但能通过寻租活动分利总产出,用 B 表示:

$$B = \frac{1-P}{R} \cdot \frac{F}{1+f} \dots\dots\dots (3)$$

(3)式显示了所有的分利村获得了均等的产出。因为分利村不创造任何产出,它们的初始资源将是非生产性的,或者说是一种浪费,这部分加上生产村分配到保护中的资源便构成了分利活动的社会成本。

2. 均衡条件

生产村的最优保护水平由(1)式和(2)式决定,将生产村的经济收益写为:

$$A = \frac{1}{1 + R/f} \cdot \frac{F}{1+f} \dots\dots\dots (4)$$

由 A 对 f 求导得到: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A}{\partial f} &= \frac{R}{(f+R)^2} \cdot \frac{F}{1+f} + \frac{F}{(1+f)^2} \cdot \frac{f}{R} \\ &= \frac{R \cdot f^2}{(f+R)^2 (1+f)^2} \dots\dots\dots (5) \end{aligned}$$

均衡条件要求满足 $\partial A / \partial f = 0$, 于是,得到最优的保护比例:

$$f = \sqrt{R} \dots\dots\dots (6)$$

可见,生产村将资源投入到保护的的比例由分利村占生产村的的比例和分利技术强度来决定。

不道德村的生产或分利决策将由它们的潜在收益大小决定,可通过比较 A 和 B 的大小来决定:

$$\frac{B}{A} = \frac{\frac{1-P}{R} \cdot \frac{F}{1+f}}{P \cdot \frac{F}{1+f}} = \frac{1-P}{P \cdot R} \dots\dots\dots (7)$$

当 $f > \sqrt{R}$ 时, $B > A$, 所有不道德村将会选择分利,即 $R=M$; 当 $f < \sqrt{R}$ 时, $B < A$, 所有不道德村将会选择生产,即 $R=0$; 当它们相等时, $B=A$, 不道德村将不会关心做生产者或是分利者,即 R 等于 0 与 M 之间的一个均衡值。另外,可以看到, R 没有进入方程(7)中,表明分利村比例不影响这一决策,因为随着分利村数量的增加,它们的平均收益将下降(Acemoglu,1995)。

所以,分利村占生产村比例 R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R = \begin{cases} M, f < \sqrt{R} \\ \bar{R} = [0, M], f = \sqrt{R} \\ 0, f > \sqrt{R} \end{cases} \dots\dots\dots (8)$$

将(6)式代入(8)式中,得到均衡的选择模式:

$$\begin{cases} f = \min(\sqrt{R}, M) \\ R = \min(M, f^2) \end{cases} \dots\dots\dots (9)$$

图 1 显示了贫困村基层组织在生产、保护和分利中的均衡选择。在 $M < \sqrt{R}$ 的情况下,即 $M=M_1$,均衡结果是 $f = \sqrt{M_1}, R=M$, 由于 $f < M$, 因此 $B > A$, 在此种情况下,所有不道德村将会选择做分利者。在 $M > \sqrt{R}$ 的情况下,即 $M=M_2$,均衡结果是 $f = \sqrt{R}, R=M$, 因此 $B=A$, 在此种情况下,生产和分利的收益相等,不道德村将不会关心去做生产者或是分利者。可以看出,在 $M < \sqrt{R}$ 的情况下, f 是 M 的一个增函数,并且当 $M = \sqrt{R}$ 时达到一个最大值; R 始终保持在 M 水平上,并且当 $M = \sqrt{R}$ 时同样达到一个最大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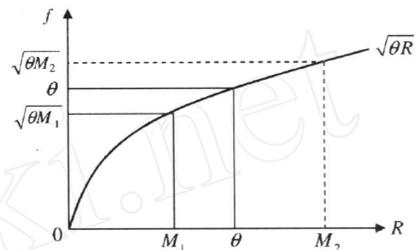


图 1 贫困村基层组织生产、保护与分利的均衡条件

将均衡方程(9)式代入到(1)式中可以得到:在 $M < \sqrt{R}$ 的情况下,生产村获得的产出比例 P 是 M 的一个减函数,在 $M = \sqrt{R}$ 时达到最小值 $1/(1+\sqrt{R})$,并且在 $M > \sqrt{R}$ 的情况下将始终保持这个最小值。

因此,根据均衡条件,在一般情况下,以下命题成立:

命题 1: 有分利动机的村数量越多,资源投向保护的的比例越高;而倾向于生产的村数量越多,资源投向保护的的比例越低。

命题 2: 有分利动机的村分利技术越高,资源投向保护的的比例越高;而有分利动机的村分利技术越低,资源投向保护的的比例越低。

3. 均衡结果

前面分析得出了贫困村基层组织的道德选择、生产和保护的资源配置以及生产和分利决策的均衡条件。那么,在这种均衡条件下,只进行生产的道德村和可以选择生产或分利的不道德村的均衡收益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将均衡条件(9)式代入(2)式中,可以得到道德村的均衡收益水平:

$$A^* = \begin{cases} \frac{F}{(1 + \sqrt{M})^2}, M < \sqrt{R} \\ \frac{F}{(1 + \sqrt{R})^2}, M > \sqrt{R} \end{cases} \dots\dots\dots (10)$$

可以看出,在 $M < \theta$ 的情况下,道德村的均衡收益 A^* 是 M 的一个递减凸函数,在 $M = \theta$ 的情况下达到最小值 $F/(1+\theta)^2$,并且在 $M > \theta$ 的情况下独立于 M ,始终保持这个最小值。

同样,我们将均衡条件(9)式代入(3)式中,可以得到不道德村的均衡收益水平:

$$B^* = \begin{cases} \frac{F}{(1+\sqrt{M})^2} \cdot \frac{\sqrt{M}}{\sqrt{M}}, M < \theta \\ \frac{F}{(1+\theta)^2}, M \geq \theta \end{cases} \quad \dots\dots (11)$$

在 $M < \theta$ 的情况下,不道德村的均衡收益 B^* 也是 M 的一个递减凸函数,在 $M = \theta$ 的情况下达到最小值 $F/(1+\theta)^2$,并且在 $M > \theta$ 的情况下独立于 M ,始终保持这个最小值。对比道德村的均衡结果,可以得到 $B^*/A^* = \sqrt{M}$,在 $M < \theta$ 的情况下,实现 $A^* < B^*$ 的均衡状态,即不道德村将能够比道德村获取更多的收益;而在 $M = \theta$ 的情况下,他们的均衡收益将在最低水平下相等。

图2更直观地显示了贫困村生产和分利的均衡收益状态。当 $M < \theta$ 时,不道德村的均衡收益曲线位于道德村的上方,不道德村通过寻租行为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而只有当 $M = \theta$ 时,只进行生产活动的道德村的收益曲线才能与不道德村的收益曲线重合,而且处于最低的均衡收益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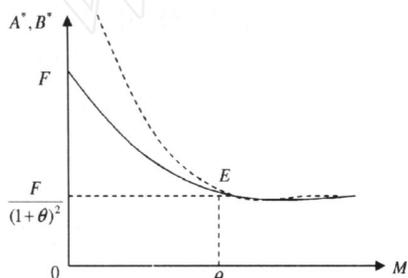


图2 贫困村的均衡收益水平

这反映了作为道德村的相对不利地位,它只有在不存在分利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大的收益水平 F ,而只要不道德村的比例不是太大,它便能通过分利行为获得相对更多的经济资源。当然,这是一种静态均衡分析,若考虑跨期的动态变化,道德村和不道德村的决策行为将会进一步作用,道德腐蚀和道德复苏问题便会出现(Grossman and Kim, 2000)。

(三) 考虑生产函数的均衡

为了便于分析,生产、保护和分利相关模型多数假定生产者的生产函数是一对一的,而较少考虑生产效率问题。在考虑贫困村分利技术的同时,我们将生产效率因素放到模型中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由于假定贫困村的贫困程度相当,各村有相同

的初始资源禀赋,而且分利技术也是“物化”的,因此我们采用重点考虑资本的指数生产函数:

$$y = k^\alpha = [F(1-f)]^\alpha, \quad 0 < \alpha < 1 \quad \dots\dots (12)$$

于是,生产村的经济收益为:

$$A = \frac{[F(1-f)]^\alpha}{1 + R/f} \quad \dots\dots (13)$$

为求最优的资源保护投入比例 f ,我们对(13)式两边取对数,然后对 f 求导数:

$$\ln A = \alpha \ln F + \alpha \ln(1-f) - \ln(f + R) + \ln f \quad \dots\dots (14)$$

$$\frac{\partial \ln A}{\partial f} = \frac{1}{A} \cdot \frac{\partial A}{\partial f} = -\frac{\alpha}{1-f} - \frac{1}{f+R} + \frac{1}{f} \quad \dots\dots (15)$$

由 $\partial A / \partial f = 0$ 得到最优的 f 应该满足:

$$f^2 + (1+\alpha)Rf - R = 0 \quad \dots\dots (16)$$

由于 $0 < f < 1$,根据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得到:

$$f = \frac{-(1+\alpha)R \pm \sqrt{[(1+\alpha)R]^2 + 4R}}{2} \\ = \frac{2}{(1+\alpha) + \sqrt{(1+\alpha)^2 + \frac{4}{R}}} \quad \dots\dots (17)$$

可以看出, f 与 α 、 R 呈正向的关系,这与前面的分析结果一致,而与 θ 呈反向的关系,即生产力或者说生产效率的提高,会降低保护活动的投入比例,生产村会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生产中,为保护资源被分利而进行的寻租活动将减少。而当 θ 趋向于 0 时, f 趋向于 1,即生产力十分低下时,生产村几乎会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向保护活动,并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发展。由此,以下命题成立:

命题 3: 生产力水平越高,经济发展能力越强,资源投向保护的比率越低,寻租活动程度趋于降低。

命题 4: 寻租活动程度越强,资源投向保护的比率越高,生产性活动趋于减少,经济发展将减缓或停滞。

不道德村的生产或分利决策仍将由它们的潜在收益大小决定,而且决策条件与一对一生产函数的分析结果一致,因为考虑指数函数的模型仍然满足 $B/A = \theta/f$ 。在考虑生产效率的情况下,贫困村基层组织的生产、保护与分利的均衡条件将产生一定的变化,生产力参数 α 进入了最优的 f 方程,从而影响到均衡选择模式,但不会改变参数 θ 和 R 的作用方式。同样,生产力参数 α 也将通过作用于 f 来影响生产村和分利村的收益,但均衡收益的动态结构与前面的模型基本一致。

四、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我们将利用以行政村为对象的农村固定观察点

数据对前面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是农业部对全国各个省份定点样本的连续监测结果,数据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代表性,能够全面地反映出行政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本文采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三年的混合数据(由于模型拟考虑的指标在不同年份存在缺省,在时间序列不多的情况下,为保证充足的自由度,我们放弃了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拟抽取898个样本村,具体不同年份的样本分布见表1。样本村的地区分布:东部地区为233个村,中部地区为248个村,西部地区为289个村,东北地区为128个村。

表1 实证检验拟采用的样本量

| | 2006年 | 2005年 | 2004年 | 合计 |
|-------------|-------|-------|-------|-----|
| 抽取样本村(个) | 293 | 305 | 300 | 898 |
| 固定观察点总样本(个) | 314 | 328 | 318 | 960 |

(二) 实证模型结构

实证模型的基本目标在于检验行政村的保护水平(寻租活动)与分利村数量、分利技术以及生产力水

$$\text{index_rent} = c(1) + c(2) \text{ per_income} + c(3) \text{ num_cadre} + c(4) \text{ edu_cadre} + c(5) \text{ age_cadre} + c(6) \text{ debt} + c(7) \text{ dum_east} + c(8) \text{ dum_west} + c(9) \text{ dum_06} + c(10) \text{ dum_05} + \dots \quad (18)$$

$$\text{per_income} = c(11) + c(12) \text{ index_rent} + c(13) \text{ subsidy} + c(14) \text{ edu_labor} + c(15) \text{ ratio_agrlabor} + c(16) \text{ capital} + \dots \quad (19)$$

(三) 变量描述

保护活动主要通过寻租行为得以实现,因此,我们考虑用寻租活动的程度来反映行政村的保护性投入水平。寻租活动可以从村集体财务收支及年末资金往来余额相关指标体现出来,这其中招待费支出是寻租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但考虑到固定观察点数据由村干部参与填写完成,可能存在“回避”行为,即将属于招待费支出的部分转移到其他项目中,根据调查问卷的内容结构,能够实现转移的途径基本上限定在“行政管理费支出”这一大项。由此,我们根据“行政管理费支出”和“总支出”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寻租指数”,以反映各个村的寻租活动程度。

$$g = \frac{\text{行政管理费支出}}{\text{年内总支出}}$$

$$\text{index_rent} = \frac{g}{1-g} \dots \quad (20)$$

$$\frac{\partial \text{index_rent}}{\partial g} > 0, \quad \frac{\partial^2 \text{index_rent}}{\partial g^2} > 0, \quad g < 1$$

g 表示“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index_rent 表示寻租指数,进行如此调整的意图在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生产性建设投入比例高的村,必然会产生相对较多的正常管理费用,为了准确反映不同行政

平之间的关系,即对前面理论分析得出的4个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由于分利村数量或比例难以通过固定观察点数据描述,命题1将不是实证检验的重点。

保护水平直接表现为村财务资源投向寻租活动,生产力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村经营总收入或人均纯收入水平来综合反映。通过理论分析得知: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行政村,尤其有较强的动力将有限的财务资源投向寻租活动,以期获得上级部门的补贴(如扶贫资金);另外,寻租活动(保护水平)将分流生产性建设资金,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的村(尤其是贫困村)难以推动经济发展,贫困状态将无法被打破。寻租活动带来的成本、资源分流导致的财务恶化,与村级贫困之间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系统,即“新贫困陷阱”(程杰,2007)。

可见,寻租活动(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采用单方程估计将难以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因此,模型拟采用系统估计方法,建立如下联立方程组:

村的寻租程度,有必要剔除这种影响。寻租指数最小值为0,表示样本村没有行政管理费支出;而当样本村的所有支出都为行政管理费时,寻租指数达到最大值(无穷大),为了便于计量分析,我们统一赋值为99。

人均纯收入用来综合反映行政村的经济发展状况、生产力水平,这一指标和寻租指数为模型待检验的内生变量,理论预期的结果为负相关,通过它们之间的KernelFit散点图(图3)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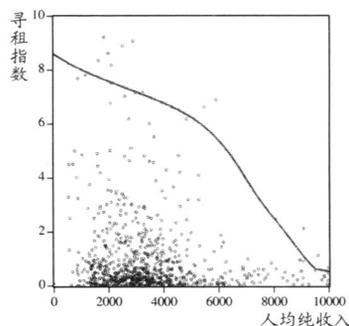


图3 人均纯收入与寻租指数之间的基本关系

村组织的寻租行为代理人是村干部,前面理论模型中的寻租技术和动力可部分地由村干部的相关指标衡量,模型拟考虑村干部的数量、村干部教育

水平、年龄结构。另外,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的样本间差异将通过虚拟变量来反映。

人均纯收入除受寻租活动的影响外,还需要考

虑村负债情况、上级补贴、劳动力教育水平、农业劳动力比重以及资本 等关键变量。表 2 反映了模型所考虑变量的基本特征。

表 2 模型拟采用变量的描述性解释

| 变量 | 名称 | 说明 | 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
| index_rent | 寻租指数 | 内生变量 | 6.87 | 99 | 0 | 22.46 |
| per_income | 人均纯收入 | 内生变量 | 3 551.21 | 33 527 | 1 | 2573.72 |
| num_cadre | 村干部人数 | 村行政干部数量 | 6.18 | 36 | 1 | 3.76 |
| edu_cadre | 村干部教育水平 | 高中以上文化干部比例 | 0.42 | 1 | 0 | 0.27 |
| age_cadre | 村干部年龄结构 | 46 岁以上干部比例 | 0.42 | 1 | 0 | 0.26 |
| debt | 负债 | 借入款余额 + 待付款余额 | 7 580.42 | 1 184047 | 0 | 55 117.35 |
| dum_east | 是否属于东部 | 是为 1,否为 0 | 0.26 | 1 | 0 | 0.44 |
| dum_west | 是否属于西部 | 是为 1,否为 0 | 0.32 | 1 | 0 | 0.47 |
| dum_06 | 是否为 2006 年样本 | 是为 1,否为 0 | 0.33 | 1 | 0 | 0.47 |
| dum_05 | 是否为 2005 年样本 | 是为 1,否为 0 | 0.34 | 1 | 0 | 0.47 |
| subsidy | 上级补贴 | 上级部门拨款 | 1 221.85 | 125 000 | 0 | 6 980.99 |
| edu_labor | 劳动力教育水平 | 初中文化以上劳动力比例 | 0.59 | 1 | 0 | 0.19 |
| ratio_agrlabor | 农业劳动力比重 |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之比 | 0.54 | 1 | 0 | 0.22 |
| capital | 资本 | 村集体年末资本 | 8 643.12 | 1 917150 | 0 | 89 021.47 |

(四)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进行估计,联立方程组估计过程中采用相同的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的计量软件为 Eview5.0, 估计结果见表 3。

表 3 2SLS 模型估计结果

| | 2SLS | |
|----------------|---|---------|
| | 系数估计值 | T 检验值 |
| c(1) | 13.2135 *** | 3.5826 |
| c(2) | -0.0030 *** | -2.3932 |
| c(3) | 0.3630 | 1.4865 |
| c(4) | -5.4544 * | -1.7282 |
| c(5) | 3.9211 | 1.3316 |
| c(6) | 1.16 × 10 ⁻⁵ | 0.7880 |
| c(7) | -0.6145 | -0.1980 |
| c(8) | -0.1621 | -0.0801 |
| c(9) | 4.7931 *** | 2.4138 |
| c(10) | 3.3959 ** | 1.7984 |
| R ² | 0.15 | |
| c(11) | 3 422.0110 *** | 3.1003 |
| c(12) | -88.0091 *** | -2.2504 |
| c(13) | 0.8054 ** | 2.0332 |
| c(14) | 1994.8060 * | 1.7281 |
| c(15) | -2237.7310 *** | -2.4428 |
| c(16) | 0.0487 ** | 1.9790 |
| R ² | 0.19 | |
| 工具变量 | num_cadreedu_cadreage_cadredum_eastdum_westdum_06 dum_05debtedu_laborratio_agrlaborcapitalc | |

注: **、*和 * 分别表示通过 1%、5% 和 10% 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行政村寻租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的关系高度显著。人均纯收入对寻租指数的边际效应为 -0.003, 而第二个方程中寻租指数对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为 -88.009, 两个系数估计结果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实证模型结果验证了前面理论分析的核心结论(命题 3 和命题

4),经济水平落后刺激寻租行为,而寻租行为进一步限制经济发展,这是中国“贫困陷阱”的本质所在。

村干部的特征变量是分利技术和寻租动力的重要因素。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村干部越多,寻租动力越大,寻租活动的可能性或程度越高,这一方面说明村干部数量的优势能体现在分利技术方面(如分工),另一方面从村干部自身利益出发,也是寻租活动的刺激因素;村干部教育水平越高,寻租程度越低,且估计系数高度显著,说明教育水平高的干部有能力、动力将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村干部年龄偏大将对寻租活动有正面的刺激效应,但显著性水平不高。可以看出,命题 2 基本符合当前的中国农村现实状况。

行政村的负债水平与寻租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财务资源缺乏、财务恶化是寻租活动的推动力,但显著性水平不高。

相对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寻租程度均较低,可以解释为:东部地区行政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建设投入的预期收益较高,远大于寻租活动带来的预期收益;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以村为对象的财政转移支付有限,从而导致寻租预期收益不高。但是,两者的显著性水平均不高。

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结果表明:2006 年和 2005 年虚拟变量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时间趋势看,行政村的寻租活动有增长的趋势,更多的财务资源将投入到寻租活动中,保护水平呈现提高的趋势。

联立方程组中第二个方程解释了寻租程度对人

均纯收入水平的负面影响,同时对其他影响人均纯收入的因素也进行了估计:上级部门补贴越多,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劳动力教育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正相关;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低;村集体资本与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实证模型的估计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遗憾:一方面,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影响保护水平的分利村数量无法放入计量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当然,这一因素的理论分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分利技术、寻租动力仅能通过村干部的特征变量予以表达,可能存在一定不全面性;此外,模型的拟合效果也存在一定的缺憾。

五、结论

生产者用于保护的资源配置与分利者比例(数量)和物化的分利技术成正向关系,而与生产者的生产力成反向关系。作为生产者和保护者角色的贫困村基层组织将一定比例的经济资源投向保护活动,这主要取决于作为分利者角色的贫困村数量、分利技术以及生产村自身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分利村比例或较为频繁的分利性寻租活动会导致生产村将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向保护,较强的分利技术和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同样具有刺激高保护水平的效应。

当前我国贫困村的高保护水平分流了用于实际生产的经济资源,从而导致生产村的经济收益低下,而在分利村数量较多的状态下,分利村的均衡收益水平并不能明显高于生产村,它们的寻租成本(上级政府的寻租收益)构成了贫困村分利行为的社会成本。最终,贫困村有可能趋向于一个低水平均衡收益的“贫困陷阱”,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验证了寻租活动(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

贫困村的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1)将扶贫资金、项目和贷款等措施制度化,严格按照实际贫困状况给予财政支持,消除贫困村之间的非正规竞争状态,以降低贫困村的分利动机和保护水平;(2)加大扶贫投资的力度,尤其是扩大扶贫支持的范围,多样化扶贫主体和方式,以降低潜在分利村的数量;(3)完善监督机制,通过村民参与扶贫的方式,提高分利行为的风险和成本;(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提高贫困村生产性活动的经济效率,以实现较低的保护投入和较高的经济收益。

进一步研究可考虑将贫困村的跨期决策的动态变化(如基层组织换届)、基层管理者的效用函数或

贫困村群众的决策行为扩展到模型中,以便更全面、深入地分析。

注释:

财务支出凭证由该村的党支部副书记提供,他原是该村所属镇一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机构改革后被精简,于2004年开始在该村担任副书记,财务核算、核销由其负责。

Solow(1960)将物化的技术解释为在一定时刻建立的资本品的生产力依存于该时刻的技术状态并且不受后续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在提高产出之前必须“物化”在新资本中。分利技术也将“物化”到分利性投入中产生作用。

重点考虑资本的指数生产函数可以看成是技术进步为资本增加型(Solow中性)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紧凑形式。完整形式为: $Y(t)=[A(t)K(t)]L(t)^{1-\theta}$,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 $k=K/A^{\theta}L$,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 $y=Y/A^{\theta}L$,其中 $\theta=1/(1-\sigma)$ 。由 $\frac{Y}{A^{\theta}L}=[\frac{AK}{A^{\theta}L}]^{\frac{1}{1-\sigma}}[\frac{L}{A^{\theta}L}]^{\frac{\sigma}{1-\sigma}}=[\frac{A^{1-\sigma}K}{L}]^{\frac{1}{1-\sigma}}[\frac{Y}{A^{\theta}L}]^{\frac{\sigma}{1-\sigma}}=[\frac{K}{A^{\theta}L}]^{\frac{1}{1-\sigma}}$ 。于是, $y=k^{\frac{1-\sigma}{1-\sigma}}$ 。

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内蒙古;西部省份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为东北地区。

村集体年内支出分五大项: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支出、上交上级部门、公益事业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其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招待费、干部工资和补贴支出。

资本由村集体年末资本来表示,具体包括:银行、信用社存款余额、村集体持有的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库存现金,对外投资余额和借出款余额。

参考文献:

- 程杰:《寻租成本、财务恶化与村级贫困——基于扶贫重点村S村的财务支出凭证》,载《中国农村经济》,2007(5)。
- 田秀华、聂清凯、夏健明、李永发:《商业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互动关系模型构建研究》,载《南方经济》,2006(4)。
- 仲黎明、刘海龙、吴冲锋:《捕食交易策略研究》,载《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6(2)。
- 大卫·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中文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 Acemoglu, Daron, 1995. “Reward Structur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9, pp. 17- 33.
- Brennan, G. and Hamlin, A., 1995. “Economizing on Virtue.”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6, pp. 35-56.
- Brickly, J. A.; Smith, C. W. and Zimmerman, J. L., 2002. “Business Ethic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 26 (9).
- Carter, John R. and Anderton, Charles H., 2001.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a Predator-prey Model of Appropri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45, pp. 83-97.

(下转第 66 页)

程,但国有银行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还是始于1998年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后。其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与1998年前的国有经济工业增加值数据因统计口径变动而不可比。

参考文献:

1. Jaffee, D. and Russell, T., 1976.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Credit Ration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0, pp. 651-666.
2. Stiglitz, J. E. and Weiss, A.,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1 (3), pp. 393-410.
3. Williamson, S. D., 1986. "Costly Monitoring,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quilibrium Credit Rationing."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18 (2), pp. 159-179.
4. Williamson, S. D., 1987.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Business Failures, and Real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5 (6), pp. 1196-1216.
5. Bernanke, B. S. and Gertler, M., 1989. "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9 (1), pp. 14-31.
6. Kiyotaki, N. and Moore, J., 1997. "Credit Cyc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5 (2), pp. 211-248.
7. Tornell, A. and Westermann, F., 2003.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in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9737.
8. 卡尔·E. 沃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中文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9. Kakes, J. and Sturm, J. E., 2002. "Monetary Policy and Bank Lending: Evidence from German Banking Group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 26 (11), pp. 2077-2092.
10. De Haan, L., 2003. "Microdata Evidence on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in the Netherlands." *Economist*, Vol. 151 (3), pp. 293-315.
11. Hülsmann, O.; Mayer, E. and Wollmershäuser, T., 2006.

"Bank Loan Supply and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German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No. 30, pp. 2893-2910.

12. Atta-Mensah, J. and Ali Dibi, 2008. "Bank Lending, Credit Shock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anadian Monetary Polic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No. 17, pp. 159-176.

13. Straub, S., 2004. "Informal Sector: The Credit Market Channe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8 (2), pp. 299-321.

14. Mateut, S.; Bougheas, S. and Mizen, P., 2005. "Trade Credit, Bank Lending and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0 (3), pp. 603-629.

15. Almeida, H. and Campello, M., 2006. "Financial Constraints, Asset Tangibili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087.

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组:《中国银行体系贷款供给的决定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载《金融研究》,2003(8)。

17. 蒋瑛琨、刘艳武、赵振全:《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兼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载《金融研究》,2005(5)。

18. 赵振全、于震、刘淼:《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载《经济研究》,2007(8)。

19. 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载《金融研究》,2002(10)。

20. 孙明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载《财经研究》,2004(3)。

21. 刘涛:《中国经济波动的信贷解释:增长与调控》,载《世界经济》,2005(12)。

22. 潘敏、夏频:《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求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载《金融研究》,2002(6)。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金融学院 长沙 410079)
(责任编辑:王红霞)

(上接第9页)

9. Durham, Y.; Hirshleifer, J. and Smith, V. L., 1998. "Do 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Poorer? Experimental Tests of a Model of Pow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pp. 970-983.
10. Grossman, Herschel I. and Kim, Minseong, 1995. "Producers and Predator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 3, pp. 169-187.
11. Grossman, Herschel I. and Kim, Minseong, 1995. "Swords or Plowshares? A Theory of the Security of Claims to Proper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3, pp. 1275-1288.
12. Grossman, Herschel I. and Kim, Minseong, 2000. "Predators, Moral Decay, and Moral Revival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pp. 173-187.
13. Grossman, Herschel I. and Kim, Minseong, 2002. "Is a Moral Disposition Rewarded?"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6, pp. 1811-1820.
14. Guttman, J., 2000. "On the Evolutionary Stability of Preference for Reciproc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pp. 31-50.
15. Hirshleifer, J., 1991. "The Paradox of Power."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3, pp. 177-200.
16. Lindbeck, A.; Nyberg, S. and Weibull, J., 1996.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in the Welfare Stat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4, pp. 1-35.

17. Mauro, P., 1998. "Corrup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69, pp. 263-279.

18. Murphy, K.;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1993.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pp. 409-414.

19. Sarte, Pierre-Daniel G., 2000. "Informality and Rent-seeking Bureaucracies in a Model of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46, pp. 173-197.

20. Sarte, Pierre-Daniel G., 2001. "Rent-seeking Bureaucracies and Oversight in a Simple Growth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Vol. 25, pp. 1345-1365.

21. Skaperdas, S., 1992.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Power in the Absence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pp. 720-739.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94)
(责任编辑:孙永平)